

灵魂的秘密

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美〕伊利·扎列茨基 (Eli Zaretsky) 著
季广茂 译



精神分析史的拓荒之作 西方文化史的经典巨著

SECRETS OF THE SOUL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013043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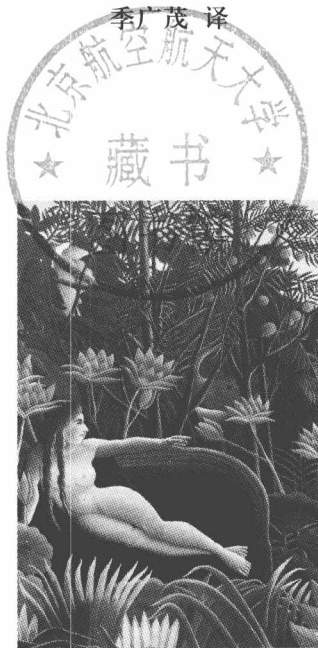
C91
227

灵魂的秘密

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美〕伊利·扎列茨基 (Eli Zaretsky) 著

季广茂 译



C91/227

SECRETS OF THE SOUL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北航

C1646843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 (美)
扎列茨基著；季广茂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5

书名原文：Secrets of the Soul: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SBN 978-7-5155-0685-2

I. ①灵… II. ①扎… ②季… III. ①精神分析社会
学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8780号

SECRETS OF THE SOUL: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by ELI ZARETSKY

Copyright: ©2004 by ELI ZARET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ARLOTTE SHEEDY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GOLDEN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作 者 (美) 伊利·扎列茨基

责任编辑 谢艳芝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75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85-2

定 价 80.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22699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 //www.jccb.com.cn](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策 划 / 王吉胜 主 编 / 季广茂

【标 点】

◎有人说：读横排书时，我们总是摇头，于是我们否定；读竖排书时，我们总是点头，于是我们肯定。

◎无论读横排书还是竖排书，都不必否定或肯定，更需要的是“标点”，即用心地“标”，尽情地“点”。没有“标点”，就没有体验，没有欣赏，没有记忆；就没有思考，没有汲取，没有生发。一句话，只能生吞活剥，而无法消化。

◎正是这“标”这“点”，构成了我们思想发展的可能的“路标”，构成了我们探究的“起点”、“生长点”。

◎“标点学术文化书坊”旨在传播西方最新学术文化成果。

◎它是学术的，但并非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还有面向大众的通俗神韵；它是面向大众的，但并非下里巴人，仍保持着应有的学术品格。

鸣 谢

本书的问世得益于我们的社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巨大转型。在我们这代人中（我生于 1940 年），弗洛伊德捕获的想象，可与他曾经谈论过的那些人物捕获的想象相媲美。这些人物包括达·芬奇、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卷入了新左翼（New Left），经历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令我思考资本主义与家庭的关系。在撰写《资本主义、家庭与私人生活》（*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一书时，我意识到，不研究弗洛伊德，就无法对这个课题做深入研究。新左翼土崩瓦解后，我再次转向精神分析，教授临床培训课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不仅学习精神分析，而且与之搏斗，与之对抗。本书记录了这场旷日持久、冲突不断却又受益良多的遭遇。在这个过程中，我蒙恩良多，难以细表。

我最大的恩人是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尽管我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思考精神分析问题，但只有在与她相遇之后，这个项目才真正成型。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她提供了大量的道德支持、编写建议和知识引导，有时甚至为此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在她众多的贡献中，她创造了“现代性的三重承诺”（threefold promise of modernity）一语。此语本来只是直觉，但经她多次澄清，终于脱颖而出。

读过初稿的人中，很多是我的密友或家人。这些人包括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亚历山大·埃特金德（Alexander Etkind）、马丁·弗莱舍（Martin Fleischer）、吉姆·吉尔伯特（Jim Gilbert）、约翰·朱迪思（John Judis）、伦纳德·赫尔夫戈特（Leonard Helfgott）、多琳·拉帕波特（Doreen Rappaport）、乔纳森·维森（Jonathan Wiesen）和娜塔莎·扎列茨基（Natasha Zaretsky）。娜塔莎·扎列茨基还校订了全部初稿。

我的代理人夏洛特·希迪 (Charlotte Sheedy) 从未对本书失去热情。我与科诺普夫出版社 (Knopf) 打交道的经历彻底否定了“出版社只对利润有兴趣”的陈词滥调。我的责编维多利亚·威尔逊 (Victoria Wilson) 耐心、敏锐地阅读、重读了本书手稿。

没有一本涉猎如此广泛的著作，能够完全依赖于档案资料。我蒙恩于众多在我之前涉足精神分析历史的巨硕鸿儒。这份恩情，我希望能在本书的注释中充分显现出来。虽然我同样蒙恩于研究文化史、社会史及种族史的同道，但我不敢肯定，这份恩情是否同样在注释中显现了出来。本书还蒙巨恩于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历史思想革命。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结交了新朋友，巩固了旧友情。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首次引导我注意葛兰西对精神分析的观察。保罗·罗厄森 (Paul Roazen) 和罗伯特·沃勒斯坦 (Robert Wallerstein) 使我免于诸多失误，但他们对本书尚存的失误没有任何责任。马里·乔·布尔 (Mari Jo Buhle)、芭芭拉·爱泼斯坦 (Barbara Epstein)、杰夫·埃斯科菲耶 (Jeff Escoffier)、雷纳·福斯特 (Rainer Forst)、玛丽·格拉克 (Mary Gluck)、泰德·科迪契克 (Ted Koditschek)、劳拉·基普尼 (Laura Kipnis)、丽贝卡·普朗特 (Rebecca Plant) 和林恩·西格尔 (Lynne Segal) 审读了部分章节。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拜访精神分析学家。我拜访过的精神分析学家包括：德国的沃纳·鲍勒伯 (Werner Bohleber)、赫尔穆特·达默 (Helmut Dahmer) 和卢茨·罗森库特 (Lutz Rosenkutter)；奥地利的恩斯特·费德恩 (Ernst Federn)；乌拉圭的马尔塞洛·韦纳尔 (Marcello Viñar)；阿根廷的卡洛斯·阿西恩 (Carlos Asian)、何塞·菲什拜因 (José Fischbein) 和苏珊娜·菲什拜因 (Susana Fischbein)。卡门·伊利扎伯 (Carmen Ilizarbe) 和花子小山 (Hanako Koyama) 提供了杰出的研究协助。雅典娜·安吉洛斯寻找了图片。我的岳父埃德·夏皮罗 (Ed Shapiro) 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最终，我没有使用他推荐的标题《冲击》(Impact)。

多年以来，我得到了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 (Newberry Library)、美国学会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Columbia) 和纽约新学院大学 (New School University) 研究生部的学术支持。新学院大学研究生部还给予我一年假期，以及大量的灵感。下列机构的热情好客和卓越的研究设备，使本人受益良多：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

schen),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伦敦惠康医学历史图书馆 (Wellcome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藏品部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美国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藏品部 (Freud Collec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纽约公共图书馆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纽约大学鲍伯斯特图书馆 (Bobst Library), 设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柏林、法兰克福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神分析学会档案室和图书馆, 设在伦敦和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赖特研究所 (Wright Institute)。

最后, 我想感谢我的双亲——大卫·扎列茨基 (David Zaretsky) 和葆琳·西尔弗曼·扎列茨基 (Pauline Silverman Zaretsky)。他们都是颇有几分精神分析才能的人。毫无疑问, 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过最强烈的影响。他们会为本书感到骄傲的。不过, 即使没有此书, 他们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还得到了自家兄弟——艾伦·扎列茨基 (Allen Zaretsky) 和亚伦·扎列茨基 (Aaron Zaretsky) ——及其家人的支持。虽然我还不能感谢我的孙子——丹尼尔·扎列茨基·维森 (Daniel Zaretsk Wiesen), 但他还是为本书的完成增色颇多。

引文著作缩写

有些著作在本书中频繁引用。为节省篇幅，缩写如下：

Freud-Abraham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精神分析对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亚伯拉罕书信集，1907—1926》（*A Psycho-analytic Dialogue: Th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and Karl Abraham, 1907 - 1926*），希尔达·亚伯拉罕（Hilda C. Abraham）与恩斯特·弗洛伊德（Ernst L. Freud）编，伯纳德·马什（Bernard Marsh）和希尔达·亚伯拉罕译，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Freud-Ferenczi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桑德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桑德尔·费伦齐通讯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Sándor Ferenczi*），伊娃·布拉班特（Eva Brabant）、恩斯特·弗莱泽德尔（Ernst Flazeder）和帕特里齐亚·詹皮耶里—多伊奇（Patrizia Giampieri-Deutsch）编，三卷本，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ud-Flies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给威廉·弗利斯的全部书信，1887—1904》（*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 - 1904*），杰弗里·穆萨伊埃夫·马森（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编译，Cambridge, Mass.: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Freud-Jone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欧内斯特·琼斯 (Ernest Jone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欧内斯特·琼斯通讯全集, 1908—1939》(*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 Freud and Ernest Jones, 1908 - 1939*), 安德鲁·帕斯考斯卡斯 (Andrew Paskauskas) 编,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ud-Jung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 (Carl G. Jung), 《弗洛伊德—荣格书信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荣格的通讯》(*The Freud-Jung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gmund Freud and C. G. Jung*), 威廉·麦圭尔 (William McGuire) 编, 拉尔夫·曼海姆 (Ralph Manheim) 和 R. F. C. 赫尔 (R. F. C. Hull) 译,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eud-Salom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鲁·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Lou Andreas-Salom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鲁·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书信集》(*Sigmund Freud and Lou Andreas-Salomé: Letters*), 恩斯特·法伊弗 (Ernst Pfeiffer) 编, 威廉与伊莱恩·罗布森—斯科特 (William and Elaine Robson-Scott) 译,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Jones

欧内斯特·琼斯,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三卷本。第一卷为《大发现的形成年代, 1856—1900》(*The Formative Year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1856 - 1900*), 第二卷为《成熟年代, 1901—1919》(*Years of Maturity, 1901—1919*), 第三卷为《最后阶段, 1919—1939》(*The Last Phase, 1919 - 1939*),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3 - 1957。

LSF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1873—1939》(*Th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恩斯特·弗洛伊德(Ernst Freud)与露西·弗洛伊德(Lucie Freud)编,塔尼亚(Tania Stern)与詹姆斯·斯特恩(James Stern)译,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

SE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该书的翻译由总编辑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主持,得到了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合作,以及阿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和阿伦·泰森(Alan Tyson)的协助。24卷本,New York: Norton, 1976。

引论：暧昧不明的精神分析遗产

弗洛伊德总是强调，人心有其巨大的威力，人心有其强大的偏见，它们要与精神分析分庭抗礼。但他从来没有说过，精神分析理念对人们产生过惊天的伟力。这惊天伟力与精神分析理念对弗洛伊德产生的惊天伟力毫无二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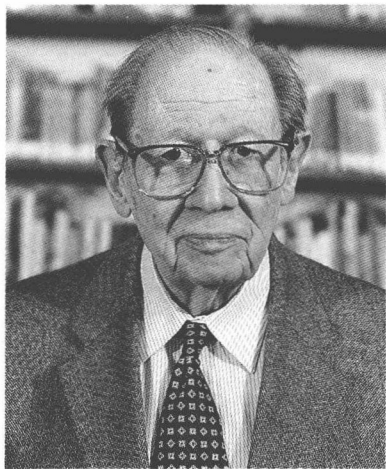
自 问世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提供给我们的都是悖论。它几乎总是被人视为解放人类的巨大力量，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现代主义中，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美福利国家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沧桑巨变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它还成了反传统政治、反女权主义、厌恶同性恋等偏见的源泉，成了一个堕落的专业，成了一门伪科学。它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甚是可疑。本书就是对这个悖论所做的探索。它旨在识别和确认精神分析思想的解放性维度，同时又不否认对精神分析所做的各种批评的有效性，不否认重新审视精神分析遗产的必要性。



弗洛伊德

这里提供的解释都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精神分析改变了全世界普通人理解自己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尽管此类研究甚是丰富，精心的诡辩和偏执的攻击更是汗牛充栋，但我们至今尚未使精神分析历史化。我们显然缺乏大型的社会、历史和知识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对于理解这种在我们的自我构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现象是必不可少的。要把精神分析置于历史的语境之内，仅仅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仅仅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不论何种历史，都必须首先解释，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强烈的诱惑，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但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对精神分析进行历史透视变得困难重重。透视需要距离。最近，特别是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的式微，这样的距离开始慢慢形成。

历史地把握精神分析，在这方面，已经有人付出过艰辛的努力。这便是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1]该书出版于1980年。那时候，精神分析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休斯克的著作以19世纪中叶伫立于维也纳议会门前的雅典娜雕像开篇。在休斯克看来，那尊雕像象征着启蒙运动，象征着新生的中产阶级理想——理性和自治（autonomy），象征着对勇气和内在心理结构——教养（*Bildung*）——的重视，而勇气和教养正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



卡尔·休斯克

所必需的。以此为大无畏的出发点，休斯克追溯了大众政治和唯美主义中的启蒙风气（Enlightenment ethos）的崩溃，追溯了人们对非理性的陶醉。休斯克认为，弗洛伊德早年立志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但后来放弃了这一勃勃野心，致力于反对19世纪90年代的大众排犹主义。休斯克最后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是一种“反政治”（counterpolitical）现象，它反映的是世纪末大撤退，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中的撤退。休斯克没有谈及他的这一立论的蕴含，但法兰克福派代表人物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克里斯托弗·拉希

(Christopher Lasch) 等人围绕着 20 世纪“心理社会”(psychological society) 这一概念, 提出了与此相关的看法。他们认为, 部分地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 启蒙运动的自治理想已经沦为某种心理主义的“自恋文化”。^[2]

休斯克的阐释至今都是不可或缺的, 也是不够充分的。一方面, 在多大程度上, 精神分析脱胎于 19 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的转型, 特别是脱胎于资产阶级中的年轻成员和女性的经验(尽管休斯克没有提到这一点)? 休斯克对此做了正确理解。家庭企业的没落, 资产阶级家庭结构的松懈, 对于消费的强调, 而不是对于纪律、积累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 的强调, 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但是, 休斯克没有看到精神分析的双重性。他把弗洛伊德主义简化为反政治的退隐(counter-political withdrawal)——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中退隐, 因而没有触及精神分析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具有的解放性之维, 尤其是对边缘性的阶级、被盘剥的阶级以及女性而言的解放性之维。

与之相比, 现在从整体上审视精神分析, 既承认其压制性的一面, 又看到其解放性的一面, 已经变得可能。关键在于, 要把它看成第一个有关“私人生活”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我所谓的私人生活(personal life), 是指这样的体验: 拥有一种身份, 而且这种身份与某人在家庭、社会和社会性劳动分工中占据的位置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 拥有私人生活, 这样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方面, 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用“私人生活”指的是对单一性(singularity)和内在性(interiority)的特定历史体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这种特定的历史体验是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现代进程为根基的, 是以家庭的历史为根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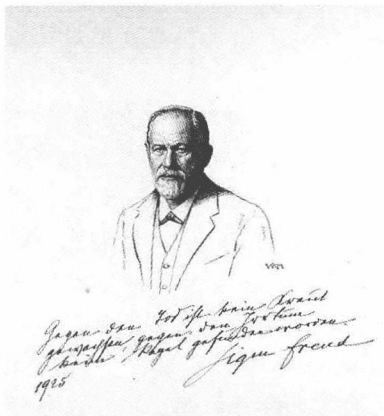
以前, 家庭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场所。^[3] 结果, 个人的身份感(sense of identity)根植于他或她在家庭中占据的位置。不过, 在 19 世纪, 有偿劳动与家务劳动(在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分离, 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 促生了新型的隐私(privacy)、深居(domesticity)和私密(intimacy)。起先, 隐私、深居和私密被体验为市场这个非人世界的家庭对应物。后来, 隐私、深居和私密与私人生活之可能性和目标联系了起来。私人生活不同于家庭生活, 甚至处于家庭生活之外。这一目标在“新”女性或独立女性之类的现象那里, 在公开的同性恋者身份的浮现中, 在年轻人从热衷于商务活动到沉迷于性实验、波西米亚和艺术现代主义的行为中, 找到了社会性的表现形式。^[4] 在那个开启了历史学家后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约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 新型的

都市空间和媒介——通俗剧院、杂耍戏院、活动电影放映机——为当时提供了参照系。个人可以依据这个参照系，想象性地建构超乎家庭之外的身份（extrafamilial identities）。结果，对于个人而言，私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和方案，而不是由他们在家庭或经济中所处的位置赋予他们的东西。于是乎形成了对私人生活的新渴求，而精神分析正是这种渴求的理论与实践。精神分析最初的历史目标是去家庭化，也就是使个人摆脱无意识的权威意象。权威意象原本根植于家庭。

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即动力无意识（dynamic unconscious）或私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理念，折射出对私人生活的这种新体验。依据精神分析的这个基本理念，社会或文化对个人的刺激，并不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先被溶化，并在内心深处予以重构。其重构的方式，是赋予那些刺激以私人的甚至怪异的意义。因此，在人的社会环境与其主体性（subjectivity）之间，并无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表明，在大型、公开的文化符号模型（patterns of cultural symbolism）与隐秘、内在的个人符号世界（symbolic worlds of individuals）之间，并无既定的匹配或融洽可言。^[5] 无意识这一概念标志着公开与隐秘、外部与内部、社会文化与私人之间的活生生的割裂。当然，精神分析还确立了研究文化、道德和历史的一般方法：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概念，它暗示我们，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人类的生活必定与这

样的模型相契合。尽管如此，它总是回到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个人就是以这些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体验那些普遍的模型的。所以，说到底，精神分析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上建立理论和实施治疗的。

私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这一概念是全新的。在传统社会中，那些以宗教迷信等方式给人治病的人是可以手到病除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只有运用既属内心又可公开交流的符号，方能妙手回春。牧师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驱除魔鬼，是因为被魔鬼缠身之人和他周围的人全都相信，世界上真的



弗洛伊德，1925。题字为：“世上本无长生不老之药，防止犯错也是痴心妄想。”

有魔鬼。^[6]同样，法国国王之所以能够通过触摸病人治愈淋巴结核，也是因为他的臣民相信，他真的拥有这样的无边法力。^[7]在上述情形下，内部与外部、公开与隐秘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早期的现代形态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强调个人良知的隐秘性。^[8]但是，良知是局部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个性（individuality）。而且，之所以赋予良知以优先权，通常是因为大家假定，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相形之下，个人心灵与文化的脱节（这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已经在爱情、友谊和日常生活之类的领域中，滋养了史无前例的、广泛的私人体验。它还带来了人们对人性深度（human depth）的新感受，而这种感受最终影响了艺术、哲学和政治。

弗洛伊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这种脱节理论化了。通过把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心理生活（mental life）中最隐秘的东西，社会独立之人必须隐藏的东西”，他在暗示我们，在隐私（private）和公开（public）之间，并无必然或直接的联系。^[9]弗洛伊德的核心洞识在于，现代人的内在生活是通过相当特殊的符号和叙事组织起来的。这些符号和叙事不仅特殊，而且没有为全社会认可的意义。这与浪漫派的自我观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自我观迥然不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弗洛伊德强调，尽管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可以阐释和理解的，但我们无法把它重新融入先前存在的任何整体之内。他没有使心烦意乱的个人返回先前业已存在的秩序（萨满教道士、用宗教迷信的方式给人治病的人以及牧师就是这样做的），而是把精神分析的事业（analytic project）概括为对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所做的私人性、临时性解释。对于这种解释，精神分析者可以促进，却无法控制。就这样，他为当时稍具雏形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自由（freedom）赋予了表现形式，为重新理解社会生活（social life）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喜忧参半。正如休斯克所言，一旦精神分析把私人生活的根基神秘化，把使私人生活得以壮大的政治前提、经济前提和文化前提模糊化，那它就会使启蒙运动做出的解放人类的承诺分崩离析。但这只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并非需要攀登的终极顶点，而是需要壮大的未竟之业。休斯克说过，雅典娜雕像象征着18世纪现代性的形成这一“哥白尼式革命”。这场“哥白尼式革命”把主体自由（subjective freedom）这一原则视为全部现代事业的核心。这样的现代事业包括艺术、道德、政治，甚至包括科学。科学在把自然进行客体化的

同时，还解放了人类。但是，这一原则更为丰富的蕴含要等到“第二次现代性”出现时才能展现出来。与休斯克的衰亡叙事（*narrative of decline*）相反，“世纪末”时期开启了第二次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与大规模生产、大众民主以及女性、同性恋者、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崛起紧密相连。如果说第一次现代性（即启蒙运动）把主体视为理性得以安身立命的场所，而理性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真理；那么，第二次现代性（人称“现代主义”）则把主体视为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置身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屈从于历史的偶然，拥有独特的个性。如果说哲学是第一次现代性的标志，那么，精神分析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一道，则是第二次现代性的标志。

如此说来，休斯克高度赞美的古典自由主义是以颇受历史制约的三个观念为根基的。第一，在19世纪中叶，自由派把自治等同于自制（*self-control*）。第二，尽管出现了女权主义潜流，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在性格和心理方面，女性与男性南辕北辙。第三，自由派相信，即使现代的、民主的社会，要想正常运作，也离不开自然等级制或社会等级制。到了“世纪末”时期，这三个信条无一例外地遭遇了挑战。对于自制（*self-control*）的强调，受到“放松”（*release*）和“轻松”（*relaxation*）的挑战，而“放松”和“轻松”则是伴随大众消费的形成而形成的。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受到进入公共生活的女性与性行为的开放的挑战。等级制受到大众民主和工会制度的挑战。这些发展深化和强化了启蒙运动的理想，而不仅是对启蒙运动的否定。作为有关现代私人生活的首个理论和实践，精神分析和上述发展一样，也具有下列潜能，即扩展和深化现代性做出的解放承诺。我们还会看到，它对自治、女性平等和民主的意义兴趣盎然。

大体言之，精神分析居于两种可能性之间：一是神秘化，二是深化现代性之意义。决定两者平衡的，是精神分析开始在巨大历史力量中扮演的角色。一言以蔽之，精神分析扮演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角色。精神分析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加尔文主义在早期资本主义、卫理公会（*Methodism*）在工业化时期扮演的角色。欲知其详，且听我来分解。

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之见，早期加尔文主义导致了它的信奉者的私人转型（*personal transformations*），这才使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了可能。如果说基督教（*Christianity*）始于耶稣的教诲，他督促信徒离家，加入真正的精神群体；那么，到了17世纪，新教（*Protestant*）“圣徒”



弗洛伊德一家祖孙三代，1878

则对家庭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将其界定为魅力意义（charismatic meaning）的容身之所，赞美其日常经济活动，赋予这些活动以伦理品格，即“天职”（calling or Beruf）。几个世纪后，卫理公会用来达到类似的目的。它为英美产业工人阶级所接纳，成了私人转型（personal transformations）的工具。它鼓励节制（abstinence）、时间规训（time discipline）^[10]和节俭（thrift）。因此，它促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宗教运动为社会经济转型提供了内在动力。倘若没有宗教运动，社会经济转型就无法赢得忠心耿耿的信徒。^[11]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精神分析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创造了工厂体系（factory system）。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美国，创造了垂直性的联合公司（vertically integrated corporation）。垂直性的联合公司不仅组织原材料和生产，而且统筹广告、营销和消费。第一次工业革命从体力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依赖高等教育、科学和心智劳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劳动和生活基本重合：工厂不大，离家不远，而农业依然是主导性的生活之道。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劳动与生活分道扬镳，正如休闲（leisure）和消费已经自立门户一样。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个人常常依然把自己的命运与社群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相形之下，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对单个人的生命的感知为标志，以家庭性质的革命性变革为标志。^[12]本书内容的排列，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轨迹同步：第一部分（1890—1914）描写其起源，第二